



docst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探索·交流·发展

第七届全国经济学·管理学博士后学术大会论文集

Explore. Exchange. Develop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 编



经济科学出版社

探索 · 交流 · 发展

第七届全国经济学·管理学 博士后学术大会论文集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 编

经济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探索·交流·发展：第七届全国经济学·管理学博士后学术大会论文集 /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编.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5

ISBN 7-5058-3543-2

I. 探... II. 财... III. ①经济学-文集 ②管理学-文集 IV. ①F0-53 ②C9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32195 号

责任编辑：张 力 闫建平

责任校对：杨晓莹

版式设计：代小卫

技术编辑：董永亨

探索·交流·发展

第七届全国经济学·管理学博士后学术大会论文集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 编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社址：北京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编：100036

总编室电话：88191217 发行部电话：88191540

网址：www.esp.com.cn

电子邮件：esp@esp.com.cn

北京毕诚彩印厂印刷

新路装订厂装订

787×1092 16 开 40.5 印张 700000 字

2003 年 5 月第一版 2003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2000 册

ISBN 7-5058-3543-2 / F·2857 定价：75.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前 言

自李政道博士于1985年向邓小平先生建议在中国建立博士后制度以来，中国博士后制度已走过了18个春秋。到2003年5月，我国几乎所有的学科都有了博士后流动站，很多著名大学、研究机构及一些企业都设立了博士后流动站或工作站，为一大批优秀博士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和更大的空间。众多的在站、出站博士后人员，在科研、教学、管理以及推动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成绩，赢得了社会的广泛认可。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过去曾经接受回国的博士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自2001年正式设立应用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以来，短短三年的时间，就有十多名博士进站工作。财政科研所把博士后工作作为重点工作之一，制定了相应的政策和管理办法，为进站的博士后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并使博士后人员成为财政科研所科研力量的生力军。

博士后的主要工作是科学研究，除需要良好的工作环境之外，更需要研究者良好的学术素养和对研究工作方向、前沿、重点的洞察力；既需要个人潜心研究、深入思考，也需要学术的相互交流、相互启发，特别是不同学科的交流。经济学和管理学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发展非常快的两个学科，新世纪我国加入WTO后，国内外形势的变化要求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迫切需要就经济学、管理学领域的前沿问题深入探讨。全国经济学管理学博士后学术大会，是一个使广大经济学管理学博士后交流研究成果、沟通研究心得的极好形式。自1997年开始，全国经济学管理学博士后学术大会已分别在北京、上海、西安、大连、成都、天津举办了六届，第七届大会原定于2003年春季在合肥召开。本次

会议由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主办，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安徽省财政科学研究所、安徽财会杂志社、含山县人民政府承办，也得到了其他各方面的大力支持。这是中国经济学管理学博士后的又一次学术盛会。

现在展现在大家面前的，是第七届全国经济学管理学博士后学术大会会议论文集，收录了经济学管理学方面的论文 60 多篇，这些论文是从博士后科研成果中优选出来的，基本代表了我国博士后研究人员在上述领域取得的最新学术成果。这是对我国经济学管理学博士后研究人员研究成果的一次检阅，相信对于从事相关研究的各类人员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在此，我谨代表第七届全国经济学管理学博士后学术大会组委会和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对所有提交论文的博士后研究人员表示感谢，对中国博士后基金会、安徽省财政厅、含山县人民政府及其他为会议提供支持的单位表示感谢，对参加会议筹备工作所有人员的辛勤劳动表示感谢。

正如本次会议的主题“WTO 框架下的中国市场经济学发展”所表示的，在我国加入 WTO 的背景下，研究中国经济学管理学的本原和前沿问题，具有重要的历史、现实意义，是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实现祖国现代化宏伟事业的需要。愿本次经济学管理学博士后学术大会，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学管理学研究发展的又一座重要里程碑。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 贾康

2003 年 5 月 20 日

目 录

前言..... 贾 康 (1)

一、文化与经济发展

文化和经济发展 杨玉成 (3)
经济信用观合理性的追寻与经济信用建设任务、措施的反思 肖士英 (11)
文化底蕴：经济发展的人文支持 丁德科 (22)
文化、社会资本、信任和经济发展
——福山社会信任理论及其意义 余章宝 (31)

二、区域优势与经济发展

区域经济差异的测定与分析 黄友爱 许敬华 (43)
创造性智力与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研究 何 枫 陈 荣 (48)
基于资产最优控制权安排演进的区域发展模式选择研究
——苏南模式与温州模式之比较 保建云 (58)
中国西部地区重大技术装备制造业基地优势与其经济发展 蒋南平 (80)
经营城市和北京市崇文区的城市经营 丁茂战 (88)
城市竞争力初探 唐礼智 (99)
论政府职能与招商引资 孙东升 (109)
产业集聚与政府制度安排 魏 然 (117)
政府与市场：一个故事的博弈论分析 赖作卿 何永坤 (127)
中国作为全球制造业基地的区位优势分析 陈安国 (135)
环境意识与环境保护行动的调查与分析 李 旭 (144)

欧盟的区域政策特点及对我国的启示 陈林生 (154)

三、公司治理与企业发展

互补性、多样化和企业组织形式的演进 周耀东 (163)

中间层理论、厂商性质与治理机制研究 李斌 (173)

公司治理模式对企业评价·产业结构的影响 王寅东 (182)

公司治理与公共治理相关性的理论研究 朱春奎 (192)

关于公司权力制衡结构 丁茂战 李维安 (202)

实物期权框架下公司治理结构的比较与借鉴 齐安甜 张维 (211)

制度变迁、路径依赖与中国的公司治理 刘汉民 (218)

硬件与软件: 构建企业核心竞争力 朱华桂 (226)

我国企业跨国经营发展与公司治理问题研究 石建勋 (232)

公司制度比较与我国公司治理改革 程承坪 段红涛 (241)

公司治理问题与企业经营者激励约束机制设计 许民利 (250)

知识经济时代的人力资源管理创新研究

——部门经理末位淘汰制方案探索 徐旭珊 (256)

公司治理与国有商业银行改革 段红涛 程承坪 (264)

论国有金融控股集团竞争力的提升: 制度基础与途径选择 孙烽 (274)

企业并购融资与市场化融资体制的建立 梁积江 (283)

机构投资者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 曾小龙 (291)

公司治理、会计控制与公司绩效 程新生 (298)

新时期中国工业技术创新政策选择 王伟光 (313)

外资并购中国企业动因的经验研究 叶勤 (323)

四、证券、金融市场的规范发展

风险收益对应的投资组合保险策略与实证分析 何荣天 (335)

宏观社会资本: 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基础 张广利 (348)

从金融工具成长方式看中国创业投资发展的阶段性 田增瑞 司森林 (360)

中国资本市场预期收益模型及其政策建议 江世银 黄毅 (365)

中国股票市场的利率政策效应的度量 陆蓉 (376)

股市预测的进化神经网络方法 高玮 (388)

股市泡沫形成与运行的系统分析 董贵昕 (398)

券商战略成本管理创新	田晓军 (410)
从国外证券业变革看我国证券公司的未来发展	齐安甜 肖 恒 (416)
公债、政府信用与财政风险的内涵与机制	许云霄 (425)
我国生物医药上市公司风险投资战略研究	张士杰 (434)
与境外证券监管机构协作监管的趋势与对策	傅 艳 (443)
我国农业投资主体的投资层次分析	刘淑贞 (452)
析金融自由化所致资本流动与金融稳定的关系	
——以 GATS 为框架所进行的分析	韩 龙 (459)
东亚金融危机：研究现状及对中国的启示	杨贵言 (469)
美国商人银行的演变与私人股市场	李大勇 (478)

五、县域经济与农业问题

论全面小康社会的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	李振明 (489)
改革开放以来的就业结构演变及其发展趋势	刘社建 (497)
中国技术引进的历程考察与历史经验的评析	吴林海 朱华桂 (508)
论政府管理资源优化配置与科技力量整合在	
沟通传统农业与市场经济中的作用	
——闽北农村管理机制创新探索与思考	林 卿 (513)
农户家庭税费负担及其程度演变趋势	史清华 (523)
农民分化视角下的农村税费制度改革	周批改 (537)
压抑与抵触：一项关于农民集体所有土地	
发展权的研究	杨明洪 刘永湘 (548)
中国鸡肉国际竞争力的国际比较分析	李秉龙 乔 娟 (560)
中国肉类产品国际竞争力研究的理论框架和	
经济分析方法	乔 娟 (574)
粮食购销平衡系统的建模研究	
——以上海市粳谷流通领域为例	王黎明 (585)

六、WTO 相关问题探讨

政府采购：制度意义与工具理性

——兼谈我国应对 WTO 《政府采购协议》的对策	江 湧 (593)
绿色壁垒的设置与我国政府的绿色管理	李 树 (601)

入世与中国政府管理对外经贸的经济手段之创新	郭秀君 (606)
加入 WTO 中国面对的西方风险资本市场及对策	庄文韬 (615)
WTO 框架下的金融业经营模式	范大路 (627)
第三方物流业的现状、问题和发展对策	蔡世锋 (633)



文化与经济发展



文化和经济发展

杨玉成

福建省委党校经济学部博士后 (350001)

〔内容提要〕 随着近年人们对经济现象和文化现象之间关系的兴趣的增长,文化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开始得到关注。尽管理论家承认文化在影响经济绩效方面的重要性,但他们对这种影响的确认和量化存在很大的争议。由于联合国有关机构的推动,对文化在发展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变迁过程中的作用的认可,逐渐变得更加明显。这种变化的核心是发展思维从单一的以商品为中心的发展模式到多元的以人为中心的发展模式的重新定位。

〔关键词〕 文化 经济绩效 经济发展 可持续性

在传统的工业化世界的经济发展分析中,文化在影响或限制经济绩效方面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当然,随着近年人们对经济现象和文化现象之间关系的兴趣的增长,文化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开始得到关注。最近的两个世界性会议明显表明对经济和文化之间关系的政治上和制度上的兴趣正在加强。一次于1998年4月在瑞典首都斯德格尔摩召开。来自世界各地150个国家的政府代表同意,在制定经济政策中,应该更多考虑文化因素。另一次于1999年10月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召开。在这个会议上,国际舞台上最重要的金融机构之一,也就是世界银行,宣称文化是经济发展的必要组成部分,因此,文化会在塑造和限制银行的经济经营方面扮演更加强有力的角色^①。本文将首先考虑文化对经济绩效的影响,然后讨论把发展过程置于文化背景中的努力,最后还将考虑可持续发展问题。

一、文化和经济绩效

如果我们接受广义上的文化定义——文化可以被看做其作用在于认同

^① David Throsby, *Economics and Cultur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xii - xiii.

群体和把一个群体粘合在一起的一组价值、信念、传统、习惯等等——那么，我们就不难看出，文化将会影响群体中的个人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并且对作为整体的群体的行为方式具有重要影响。当然，对小的群体譬如说公司而言，群体的同一性围绕公司精神建立，而对大的群体譬如说民族而言，分享的价值可能包括宗教信仰、社会习惯、继承的传统，等等。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这两个情形所表达的就是，群体的同一性和价值会塑造个人的偏好模式，从而塑造他们的经济行为。

对一个群体而言，文化可能从三个方面影响经济结果。首先，文化会影响经济效率，其途径是增进群体的共享价值。这种分享价值会影响群体成员从事经济生产过程的方式。譬如说，如果这些文化价值有助于更有效的决策，有助于更快的和变革的创新，并且在处理变迁中，有助于更具适应性的行为，那么，经济的生产率和群体的活力终究可能在公司的更好的财务结果中得到反映，或者在更高的增长率中得到反映。

其次，譬如说，通过反复灌输“关心他人”这个共享的道德原则，并因此鼓励建立这种关心能够得到表达的机制，文化可能影响公平。在作为整体的社会中，如果提供给未来数代人的道德义务是公认的文化价值，这种影响的重要方面可能在代际的公平中看到。通常，文化对公平的影响可以在群体的资源配置决定中看到，群体的目标在于让其成员获得公平的结果。

再次，文化可能被视为影响甚或决定群体决心追求的经济和社会目标。在小群体层次上，譬如说在个体厂商层次上，公司文化可能是一种关心和关注雇员及其工作条件的文化，这些价值可能减小厂商目标中的追求利润或其他经济目标的重要性。在社会层次上，文化价值可能完全和物质进步的追求相一致，使宏观经济成就的标准能够习惯于区分成功的社会和不成功的社会。另一方面，其他社会的文化可能软化对物质报酬的追求，支持与各种生活质量相关的非物质的目标，从而影响经济增长的速度和方向；在这种情形中，界定“成功”和“不成功”的标准不同于前一个情形。

通过这三条途径，文化对个人行为的影响将会在集体结果中得到反应。因此，譬如说，在集合层次上，我们可以从诸如人均 GDP 增长率、技术替换率、就业水平、结构改造比率和方向等效率指标角度，观测文化对宏观经济结果的影响，并且可以从诸如收入分配模式、社会福利方案（尤其是对老弱病残的关心）、社会服务供给和接受长期公共投资方案（这种方案可能不会使当代人得到多少直接的受益）的意愿角度，观测文化对宏观经济结果的影响。

一些经济理论家认为，在确认文化对经济绩效的影响和在对这种影响进行量化中，经济分析能够获得进步。他们力图详细说明影响厂商之间关系（诸如协作和竞争）和厂商内部关系（诸如组织行为）的文化变量，并且假设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它们对经济结果的影响^①。然而，另一些经济理论家对文化影响的确认和量化持怀疑态度。例如，在宏观经济层次上，关于文化因素是否以及多大程度上在决定不同国家的经济绩效方面扮演角色，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是推测。譬如说，对二战后日本的增长的根源，以及对更为晚近的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的增长的根源，存在广泛的争论。一些人认为，这些国家的经济要素对其快速增长有重要的贡献，这些要素包括稳定的宏观经济管理、竞争的改善、强烈的出口导向、“急起直追”技术变革的压力、人力资本投资，等等。另一些人认为，文化的作用更为基本，并且更为普遍，源自儒家学说的某些文化原则，有助于给经济成功创造条件。这些要素包括对福利和群体的相互尊重的关注、成就取向的工作伦理、对家庭重要性的尊重、对教育需要的信仰、对等级制度和权威的尊重等等^②。具体看一看日本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到，诸如宗教、家庭态度、文化同质社会的合作模式，等等，塑造了日本的公共制度和公司制度以及它们的操作方式；日本社会的文化基础可以被看做已经以这种方式渗透日本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

解决关于文化对经济绩效的影响的各种理论争议的困难是，检验竞争性理论的适当数据的可获得性。不过，在收集和解释有关文化和经济的经验信息方面，已经获得某种进展。例如，对相关文化特性及其在遍及全国的经济增长模型中的内含物的衡量，开始更为明显地表明，经济活动的文化背景量上的重要性。譬如说，罗纳德·恩格里哈特把一系列国家的范围相当广泛的个人对宗教、工作、家庭和社会问题的态度列成表格，并把它们和经济成就相联系^③。在一个可选择经验分析进路中，西沃论辩说，文化因素不应该被解释为个体社会行为本身，而应该被看做社会层次上的一系列有序的、制度化的文化安排^④。他认为，只有在该层次上，人们才能够把文化行为和经济活动相联系。

① Mark Casson, "Cultural determinants of economic performance",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17: 418-42.

② 对“亚洲奇迹”的标准的正统评估在世界银行的资助下进行，参看世界银行：《亚洲奇迹：经济增长和公共政策》，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年。

③ 罗纳德·恩格里哈特 (Ronald Inglehart)，《发达工业社会的文化转换》，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0年。

④ 西沃 (Hsin-Huang Michael Hsiao)，“东亚发展模型：经验的解释”，载于伯格和西奥编的《探究东亚发展模型》，交易出版社，1993年，第20页。

二、文化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

现在，我们从影响经济绩效的文化功能角色转向更为基本的问题：经济发展意味着什么以及文化如何影响经济发展过程。作为全体居民的物质状况之改善的经济发展概念可以追溯到 19 世纪的政治经济学家，甚至更早。在 20 世纪中叶经济学家所理解的经济理论中，仍然明显把增长等同于物质进步。因此，西蒙·库兹涅特在 1966 年写道，“我们把国民经济的增长等同于人均产品或每个工人的产品的持续增长”^①。当然，在发展中国家，关于什么东西构成进步的这个严格的观点，逐渐被反映更广泛系列的社会需要及其对改善生活水平之渴望的发展概念所取代。在这个更为一般的意义上说，“发展”确实包括物质福利的提高（以人均 GDP 和可支配收入的增长衡量），它同时包括一系列社会指标的变化，如居民的营养水平、健康状况、识字率、教育机会、公共或福利服务供给的标准，以及许多非物质的特征，这些特征被包括在“生活质量”这个题目下，包括诸如空气质量和水的质量这样的环境指标。另外，“人均”这个衡量标准掩盖了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这个事实已经被广泛认识到，再分配作为发展过程要素之一的重要性被广泛认可。当今的经济发展理论基本上都开始接受这种更加广泛的解释。不过，焦点仍然明显在物质进步上，尤其是最贫困的群体的物质进步上，把物质进步作为发展中世界发展的主要指标。

通过指涉人类对食物、住房和衣物的基本需要（据说这些需要能够仅仅通过物质状况的改善而得到满足），这种观点很容易被合理化。另外，有人争辩说，人们对生活质量的各个方面的改善的欲求，包括对诸如环境舒适这种非物质特征的欲求，只能通过经济发展（用物质标准衡量）得到保证。在这个范式内，无论文化作为对物质进步成就的中介影响，还是作为不同社会所感受的需要和欲求的结构要素，都很少起作用或不起作用。结果，正如卢坦所说的，文化的考虑已经被投入发展思想和实践的“地狱”；他在 20 世纪 80 年代晚期和 90 年代早期所撰写的论著中认为，没有任何发展经济学家会同意这个命题：文化变量在解释政治和经济发展中可能是重要的^②。实际上，经济发展的主流教科书对文化没有兴趣，多数教科

^① 库兹涅特 (Simon Kuznets):《现代经济增长:速度、结构和跨度》,耶鲁大学出版社 1966 年版,第 1 页。

^② 卢坦 (Vernon Ruttan), 1988, “文化天赋和经济发展:我们能够从人类学学到什么?”,《经济发展和文化变迁》,第 36 卷(增补本); 1991, “什么东西落到政治发展上?”,《经济发展和文化变迁》,第 39 卷。

书的主题索引没有提到文化。

当然，虽有这种正统观念，但在考虑发展中，存在明显的转换。这种转换表现在重新聚焦于人本身，把人看做既是发展的目标，又是发展得以发现的代理人。因此，以商品为中心的经济发展观念让位于以人为中心的人类发展战略。这种焦点的转换开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晚期，此时联合国 1990 年发展战略把人类发展接受为它的核心焦点，而且联合国发展计划署建立它的年度《人类发展报告》。第一个报告出现于 1991 年。人类发展的目的被解释为扩展人们过他们想要过的那种生活的能力。阿马特亚·森论辩说，尽管人均产出的增长可能扩大这种能力，但是，发展的终极关注不应该是这种产出本身^①。

发展思维沿着这些路线的重新定位具有明显的文化含义。作为发展目标和发展手段的人并不孤立存在。他们以各种各样的方式相互作用，并且这种相互作用在其中发生的框架由他们的文化提供——他们共享的信念、价值、语言、传统，等等，这些东西把他们的日常生活置于背景中。正如联合国世界文化和发展委员会所表明的，用人的术语使发展重新概念化，把文化从发展思维的边缘引入，并把它置于核心层次。在经济发展的这种情境观念中，人类发展和文化发展可能被吸收进关于发展中世界之转型的更为全面的理论中。

这种理论的严格的系统表述仍然有待解决，但是，识别出现在当代思想史中的新的发展范式的几个可能的特征是可能的。首先，新的发展模型不可能接纳严格的单方向的因果性。相反，模型要素的相互联系，连同在许多方向同时滑动的影响，可能被强调。譬如说，文化特性的影响和特定社会对诸如每个工人产出的传统经济变量的渴望，可能通过劳动生产率对改变价值的影响的解释而得到平衡。其次，与此相关，人们承认，无论是文化还是经济，都不是静态的东西，而是不断变化的东西，以致变量之间的关系是动态的过程，而不是固定的常项。再次，没有任何单一的发展模式适合一切环境，相反，国家（这些国家带来不同的经济、社会、文化和制度条件）之间发展道路的差异，决定发展规范在每个特殊的情况中应该如何制定^②。第四，新的范式可能把多元论，而不是一致性，看做实质部分，尤其是承认，人类的发展开始于局部层次，在那里，共同体之内和之

^① 阿马特亚·森，1990，“作为能力扩展的发展”，载于 Keith Griffin 和 John Knight 编的《人类发展和 1990 年代国际发展战略》，伦敦，麦克米伦出版社，第 41~58 页。

^② 关于路径依赖和路径独立的发展模式的进一步讨论，参看 J. Mohan Rao 编：《全球化、私有化和自由市场经济》，Quorum 图书公司，1998 年。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间的文化多样性是文明的人类存在的重要标志。最后，多元论的伴随物是文化的自由，包括社会选择它们想要的那种发展的集体自由和作为自由社会观念之核心的个人权利。这些自由以制度结构为前提，通过集体协议确立，并且通过国家和市民社会运作，市民社会提供这种自由得到拥护的保证。因此，注意制度安排同时可能凸现在这个发展模式^①。

三、文化和可持续发展

对经济和文化价值作为发展模型的诉求，连同对经济发展和文化变迁的长期性和演进性的认可，使可持续性观念成为自然的参考框架，在其中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分析结合为一个整体。另外，鉴于可持续性的主要含义之一必定与自然环境及其与经济的关系有关，并且鉴于自然和文化环境之间以及自然资本和文化资本之间的相似性，人们很容易提议，可持续性的环境解释在文化领域具有对应物。

可持续原则给探讨经济发展中的广泛的文化问题提供了基础。实际上，人们可以认为，他们可能详细说明“文化上可持续”的发展类型或模型，这种说明的标准相似于从生态上和环境上的可持续发展得出的公式。因此，我们可以接受物质的和非物质发展的原则、跨代和代内平等的原则、保护文化多样性原则、预防原则和把系统相互依赖认可为评价文化发展过程、战略或特殊方案的标准。在事物的总体框架内，文化上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会扩展，并且补充这个预期：它应该在生态上是可持续的。

这种观念开始反映国际社会对发展政策的讨论。例如，1998年4月在瑞典首都斯德格乐摩召开的关于文化发展政策的国际政府会议上，150个政府代表一致同意的第一个政策目标是，使文化政策成为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提议，政府应该确立政策，这种政策承认文化在发展中的普遍的重要性，从而使文化政策“变成内生的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组成部分之一”^②。

转向发展援助的操作世界，我们可以注意到，文化在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现在似乎占据发展思维的最显著的位置。例如，世界银行每年支出数百万美元，用于给贫困国家的发展贷款。在它那里，可持续发展观念大约

^① 关于与文化信念相关的制度结构的重要性的分析，参看 Grief (1994)，“文化信念和社会的组织：对集体主义社会和个人主义社会的历史的和理论的反思”，《政治经济学杂志》，第 102 卷，第 912 ~ 950 页。

^② 参看联合国教育、科学和文化组织 (1998)，关于文化发展政策国际政府会议的最终报告，第 14 页。

在 10 年前引入，打开了包含环境和社会关注的发展范式。但是，文化的进一步延伸是近几年的事，部分是对思考经济发展的广泛基础的转型的回应。关于在双边的和多边的发展援助的国际舞台上，文化现在如何被看待，可以重点强调三个方面。

首先，如果全球化确实传播物质价值和标准化的大众通俗文化形式，它可能被看做地方文化差异的潜在威胁，也许会导致社会异化和社会混乱。因为这个，发展援助的越来越重要的目标是地方文化价值的培养和建立。其次，在系统表述特别的纲领和方案时，现在注意转向迎合对地方传统和制度的介入，利用地方专家和知识，并且强调共同体内和共同体之间的文化上的相互作用。再次，尤其针对贫穷国家的纲领可能认识到，在活跃共同体和改善他们的自尊方面，文化的合法化可能多么重要。如果特别针对文化目标，把文化表达和意识提高为物质环境改善的伴随物，减贫计划可能因此更加有效。

这些考虑开始对发展援助组织、援助机构认识其作用和执行其职责的方式产生影响。例如，现在，世界银行已经详细说明这个事实：文化直接贡献于它的核心发展目标。在发展的背景中，它认为文化有助于：（1）给贫穷社会提供从其自己的文化知识和生产中创造收入的机会，从而摆脱贫困；（2）通过多样的社会资源、文化资源、经济资源和物质资源催化局层次的发展；（3）通过复兴城市中心、保护具有社会意义的自然资源和创造可持续的、重要的旅游收入，保存现存的文化资产，并从中获得收益；（4）强化社会资本——尤其是给贫困的、边缘化的群体追求增强其自尊和效能的活动提供基础，并且强化多样性和社会包含物，以便他们能够分享经济发展的利益^①。

世界银行在其操作工作中追求这些行动路线，首先努力把文化的考虑和贷款战略结合在一起。其次，在其农村地区发展工作中提升文化。再次，尤其与借款国家的文化计划接洽，如各种遗产方案。

四、结 论

本文已经指出在思考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性质方面的范式转换。当然，应该说明的是，绝不是所有的发展经济学家，更不是所有的增长理论家，都把这种转换看做是重要的，并且一些理论家根本不承认这种转换的存在。

^① 世界银行（1999）：《文化和可持续发展：一个行动框架》，第 15 页。

不过，对文化在影响小群体和大群体的经济绩效中的作用的认可，以及更为特别地，对文化在发展中国家的基本的和决定性的经济增长和变迁过程中的作用的认可，逐渐变得更加明显。这种变化的核心是发展思维从单一的以商品为中心的发展模式到多元的以人为中心的发展模式的重新定位。当然，令人好奇的是，发展思维的转换，在实际的发展援助世界比在理论舞台（范式转换通常的发源地），更加明显。世界银行和其他发展机构把文化在发展中的显著作用看做正在发生的范式转换的某种证明。

参考文献：（略）

作者简介：杨玉成，福建省委党校经济学部副教授。

电 话：（0591）3712183

E-mail：yuchengyang@sina.com

经济信用观合理性的追寻与经济 信用建设任务、措施的反思

肖士英

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理论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

〔内容提要〕经济信用现实危机的实质，是现实经济信用观合理性危机的表现。消除经济信用现实危机的思想前提，在于摆脱种种片面的经济信用观，建构起以人生存的完整自由为根本取向的人文本位的经济信用观。而提高经济信用水平的关键，则在于依托于合理的信用观，着眼于人主体性与受动性的矛盾统一关系，在自律与他律的结合中，培育起经济行为人自觉守信的内在意识系统。

〔关键词〕经济信用观 生存自由 人文本位 “个我”与“他我” 守信意识

本来有着重义轻利传统的中国，今天何以出现经济信用危机？市场经济制度极其发达的美国，何以连续出现经济信用丑闻？两个最不该出现信用危机的国家为失信严重困扰的现实，一时间使经济信用成为学界讨论的热点。笔者认为，经济信用观是人类依据对经济信用与人生存发展关系的实践体悟，所逐渐形成的关于经济信用的总体性、根本性的理念系统。它作为主客观属性的统一体，通过规定人理解经济信用与人生存发展关系的角度和性质，而赋予人信用行为以特定取向；又通过对人信用行为的渗透和规范，而间接地作用于现实经济信用生活，使其统一于特定经济信用理想。信用行为固然受种种力量约束，但其现实取向却是经由信用观对种种约束力量的整合而确定的；相应的，信用行为的性质也受信用观的引导和调控。故经济信用问题讨论的有效性、进而问题根本解决的可能性，取决于经济信用观和经济信用建设措施的合理性程度。所以，探寻合理的经济信用观并据此确定经济信用建设的合理路径，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之所在。

一、既有经济信用观的根本缺陷

“我们应有效地避免不断地困扰着经济伦理学的两种危险。一种是道德

理想主义，认为人们可以忽视经济学作为一种分析手段的贡献，和经济刺激对实现伦理目标的帮助。另一种危险是工具化，即伦理被误用来仅作为取得经济目标的手段”。然而就具有经济伦理学属性的既有经济信用观而言，其缺陷远不止于此。

1. 基于“经济人”假设的经济信用观的单向度缺陷

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经济信用观是以“经济人”假设为前提的。该假设作为对问题进行“理想类型”层面的研究的一种简化了的前提约定，其本身并无不妥。然而，西方主流经济学界对这种“理想类型”层面的研究结论长期超越其有效性范围的使用，使经济学界逐渐淡化和忽视了“经济人”的假设性质，将其直接看做经济行为人普遍具有的现实品性。受此影响和误导，社会上也出现了把“经济人”及其品性的逻辑分析，直接等同于现实经济行为人及其全部品性的观念。这不仅使得“经济人”假设客观地成为为失信行为提供合理性支撑的理论根据，而且也使得经济信用的本质仅仅被理解为个人基于功利收益最大化考虑，按照成本收益比较分析原则，以放弃短期利益为代价，通过信守和约来追逐长期利益的过程和状态：“对失信行为，经济学的通常解释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对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追求使得人们根据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的原则做出经济选择，人们从失信行为中得到的好处（收益）要大于他为此所付出的代价（成本）。这个解释抓住了关键之所在”。对经济信用本质的这种纯功利化把握，消解了守信与失信在社会历史高度的合理性的差异，从而使失信完全可以合理地作为功利资源来开发。可见，对经济信用的这种观念，本质上是一种仅追求个人功利的单向度的信用观。

2. 传统的德性化的经济信用观的内在缺陷

中国传统文化伦理本位的特质，决定了伦理是认识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孔子曾言：“君子义以为质，理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人无信不立”，“民无信不立”。显然，“义”在传统文化中被确立为社会所应推崇的君子人格的根本属性，“信”则是获得该属性的必要条件。否则，“言无常信，行无常贞，唯利所在，无所不倾，是则可谓小人矣”。但孔子所强调的信义完全是自因的、超功利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同样，孟子也主张“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已”。可见，中国传统的经济信用观，是一种拒斥功利的德性本位的信用观，经济信用仅被看做德性人格得以可能的根本前提条件，忽视了经济信用的其他社会意蕴，

故它本质上也是一种唯德性化的单向度的经济信用观。

3. 经济信用观单向度缺陷的根源分析

经济信用作为整体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必然渗透、积淀着丰富深邃的人生社会意蕴。但由于社会分工所决定的人视野的破碎性、狭隘性，特别是由于现实社会尚缺乏消除分工导致的社会分裂的有效社会整合，人们往往仅从生活某领域、某层面来理解经济信用，把其某方面的取向绝对化为约束经济信用的惟一原则，忽视或否定了经济信用的其他内在参量，从而就形成了单一取向的极端狭隘的经济信用观。例如，中国传统民间社会认为讲求经济信用是一种积德行为，但之所以要如此“积德”，原因就在于人们普遍有一种“积德积福”的朴素而近乎神秘的观念。再例如，人们把一个家族人丁是否兴旺、是否有出息的原因，也往往归结于他们的先人在经商活动中是否诚信：诚信者人丁兴旺，欺诈而亏了人的，其后世则一定是不旺的。显然，这实际上是一种单一的因果报应论的经济信用观。西欧中世纪宗教经济学家把一切经济活动都神性化了，从而也就自然从神性角度，来理解经济信用活动的内在意义。而在极“左”年代里，经济信用也就自然会被看做受阶级意志支配的现象。

二、合理的经济信用观的追寻

对自由的追求是人终极的本质属性。“自由是人们的价值标准与发展目标中自身固有的组成部分，它自身就是价值，因而不需要通过与其他有价值的事物的联系来表现其价值，也不需要通过对别的有价值的事物起促进作用而显示其重要性”。故“必须把人类自由作为发展的至高目的”。人只有超越盲目必然性的支配去实现生存的自由，其生存才能与其内在的主体性本质和根据相一致，从而其生存才能因与人主体性本质的一致性，而成为真正属于人的生存。当然，人所追求的自由总是具体的、现实的，如阿马蒂亚·森所言，这种“自由包括免受困苦——诸如饥饿、营养不良、可避免的疾病、过早死亡之类——基本的可行能力，以及能够识字算数、享受政治参与等等的自由”。不过，生存要素、过程的复杂性，决定了人所追求的自由除了森所列举的上述内容外，不但还有精神、物质生活不同领域、不同层面更宽广、深刻、个性化的内容，而且是由多元性内容的相互协调所构成的有机整体。

人生存自由必然受其生存实践过程的制约。从根本上看，这一过程由

从事生存实践活动的人及其生存实践活动的特定内容这两个基本环节构成。故生存实践过程对人生存自由的制约，就具体表现为上述两个基本环节的制约。

“我”是个人的基本存在形式。孤立地看，任何一个独立的人，都直接表现为单个的“我”，即“个我”。这类意义上的“我”，是个人直接的、个体性的存在形式。然而，社会性决定了任何个人必然依赖于他人、群体和人类总体，并因此而与后者具有一定程度的同一性。这种同一性决定了后者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个人特定的存在形式，是个人除“个我”之外的另类意义上的“我”，即“他我”、“群我”和“类我”。当然，“他我”、“群我”和“类我”，并非个人直接性的存在形式，而是其间接的社会化的存在形式，因而可称之为个人的“社会我”的存在形式。“个我”与“社会我”就成为个人的二重存在形式，并通过相互统一，构成了完整的个人。于是，生存实践中的人对生存自由的制约，就具体表现为“个我”与“社会我”有机统一体对生存自由的制约。具体来说，这种制约表现在，只有当个人把其生存提升到“个我”与“社会我”有机统一高度来定位时，才能因捍卫了个人与他人、群体和人类总体间客观的不可分割的统一性关系，而不但为其自身，而且为他人、群体和人类总体生存自由的实现，消除了由他们所可能陷入的对立必然导致的障碍，从而有效地促成个人与他人、群体和人类总体生存自由的实现。具体到经济信用活动来说，若经济行为人把“个我”与“社会我”的有机统一看做其生存的完整形态，他就会在“个我”与“社会我”有机统一高度来理解经济信用的意义，并自觉地去遵守经济信用规范，从而使个人与他人、群体和人类总体的经济生活自由都得到实现。反之，若经济行为人仅根据“个我”的要求来理解经济信用的意义，他就会使他人、群体和人类总体的利益从属于“个我”层面的狭隘利益，把其完全工具化，其结果失信于他人、群体和人类总体，以追求“个我”层面的狭隘利益，便逻辑地成为其行为的必然取向。而失信所造成的他人、群体和人类总体的利益的损害及失信所必然招致的社会制裁，必然使“个我”的利益和整个社会全面的生存自由都受到损害。可见，无论从“个我”层面来看，还是从“社会我”层面来看，经济信用都与人生存自由有着内在本质的关联，离开它，就决无生存自由可言。

现代性条件下，人生存内容无非是功利性与超功利性、精神性与物质性等多元性、开放性内容所交织而成的复杂的矛盾统一整体。人生存的完整性，正是由其生存内容的这种完整性支撑的；人的生存自由也具体表现为其每一生存内容所具有、所获得的自由。人生存内容的多元性整体有任

何缺失，或该多元性整体失去了内在协调，人的生存就失去了相应的自由。经济信用固然要以追求现实功利为基础、前提和首要目标，然而，人生存内容的多元性、复杂性和整体性，决定了经济信用不仅受功利力量的约束，也受超功利力量的限制；既与经济因素有本质关联，同时也与政治、教育、历史、知识背景、外在自然与社会环境等力量相互作用着；既受认识等理性因素制约，也与情感、意志、本能、信仰、偏好、气质等非理性因素渗透融会在一起；既有微观基础，也有宏观根据。这就决定了人们经济信用活动的内在取向，必然是现实经济功利的追求，和其他非功利、超功利的追求的矛盾统一体。当然，这两种追求在该统一体中的地位是不平衡的，前者无疑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后者则无疑是矛盾的次要方面。但这两个方面却都制约着经济信用活动中人生存的自由状态。故对经济信用的追求，必须同时着眼于这两个不同方面的要求。否则，强调一方忽视另一方，经济信用活动都必然是不健康的，都必然导致人生存自由的失落。

是否自觉遵奉经济信用既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人能否超越盲目必然性的奴役，有效地实现其生存自由，那么，经济信用在一定程度上就无疑是人成为自由的人的终极根据的组成部分，是自由人格无法剥离、无法超越的内在本质属性。这一点古人早就看得很明白：“商贾敦悫无诈，则商旅安，货财通，而国求给矣”。“人无信不立”，“民无信不立”；“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车兀，小车无车兀，其何以行之哉？”“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言无常信，行无常贞，唯利所在，无所不倾，是则可谓小人矣”。孔子的这些论述，作为相互联通、相互注解的整体，全面地规定了“信”与人生存自由间的多层级内在本质联系，并从根本上把信用确定为自由人格内在的本质属性：首先，“信”被理解和规定为人生存可能性的基础，从而是否有“信”，直接决定着人生存的可能性状况。其次，“信”被理解和规定为人生存的“君子”即高度文明的人格必要的内在构成条件。再次，“信”直接规定着人能否获得自由、能否作为文明的、自由的人而生存，从而成为自由人格的本质规定。无“信”，人就要被物役或寄生于他人，就不会成为自立自由的人。他这里所谓的“君子”、“小人”固然有人格贵贱之分，但更主要的是指自由或被奴役的人格状态：“信”使人获得自由人格从而成为“君子”，失“信”使人沦入被奴役状态，从而成为“小人”。现实生活中，那些靠诈骗、行贿获利的人，不正是这样的被外力役使而失去自我的小人吗？

上述分析既然已经表明：自由是人的终极本质和人生活的最高准则；经济信用是人生存自由的重要约束条件，是人生存自由所必须遵奉的客观

法则，进而也是自由人格内在的本质的规定性，是人之为人的终极性根据的内在组成环节；经济信用对生存自由的约束，是通过“个我”与“社会我”统一的状况，及人多元性生存内容协调统一状况的约束而间接实现的，那么，总括地看，合理的经济信用观，就只能以追求“个我”与“社会我”的有机统一，及人多元性生活内容的协调发展为基本切入点，以经济收益率的最大化为手段，以自由人格的塑造为最高原则，以人生存的完整自由为根本取向和具体内容的人文本位的经济信用观。它作为由生存实践经验升华而成的自律性生存智慧，其根本精神就在于，把人从种种片面生存状态中提升出来，使人摆脱外在力量的奴役，成为充分自主和享有完整自由的人。

三、经济信用建设的根本任务与自律、他律相结合的系统化建设路径的开拓

1. 经济信用建设的根本任务

信用行为固然受信用观制导，但信用观毕竟是纯理性的，而人意识系统却是理性与非理性的统一体；同时，社会存在也毕竟是一切社会现象由以生发的基础，故合理的信用观与自觉守信意识并不完全就是一回事。由于守信行为直接受其守信意识调控，故经济信用建设的根本任务，就在于依据合理的信用观，积极创造条件，培育起人自觉守信的意识系统。人既是世界的主人，同时其生存又受世界的限制。故对这种守信意识的培育，必须把人的主体性与人对外在世界的依赖性（即人对世界的受动性）的矛盾统一，作为其基本着眼点。

主体性决定了人总要自觉超越外在力量的束缚，去追求生存的自由。经济信用是人生存自由的必要条件，故人基于生存自由的渴望，通过自我约束无条件地追求经济信用的守信意识，就是一种自律性的内在自觉的守信意识。这种守信意识不但决不会因外在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特别是不会因信用成本与信用收益关系的失衡而有任何波动，而且还必然与人生存活动相始终。但这决不意味着这种意识是人自发的直接现实性的意识，人的主体性实现的过程性，决定了这种意识潜在于人本质之中，它的现实化仍需要人去激发、培育。

受动性作为与人主体性相对应的又一重本质规定性，决定了人不能不从经济信用对生存的可能性、生存的功利收益的依赖性角度，来认识和规

定经济信用。由此所生成的守信意识，必然是追求着生存的可能性、安全性和生存的功利目标的守信意识。这种守信意识即使是自觉的，那也只是一成本收益比较分析意义上的自觉，是避免失信惩罚恶果意义上的自觉，是一种理性化、工具化、功利化的保守、被动、技术性的自觉，因而在本质上也只是一种有条件的、相对的、暂时的自觉，即是一种外在条件约束下的、他律性自觉。故这种自觉守信意识本质上只能是一种他律性的相对的有条件的自觉守信意识。现实生活中，那种因维护功利收益、惧怕法律的、经济的及其他社会性惩罚，而理性的有条件的自觉守信的意识，就是该类型守信意识的表现。

主体性和受动性作为人无法剥离、超越的矛盾统一的两种本质属性，决定了自律性的和他律性的两种自觉守信意识，在合理性和价值地位上，并无高低优劣之分。故经济信用建设的根本任务，就在于培育上述两类自觉守信的意识系统。然而，就经济信用建设的现实和有关讨论来看，受西方主流经济学自由主义和功利主义思潮的影响，人们往往只重视他律性的守信意识的培育，忽视自律性的守信意识及其培育，从而对经济信用危机的治理也就自然缺乏根本的有效性。

2. 自律性自觉守信意识的内省化培育

主体性决定了人能够以如下自省方式，有效地培育自律性的自觉守信意识。

(1) 哲学地透视经济生活，构筑合理信用意识普遍生成的根本思想前提。追求人生存的完整自由作为新信用观所揭示的经济信用的根本精神，是对人存在的价值、经济信用与人生存的关系进行哲学高度的终极性批判反思的产物，它不可能自发地生成和弥漫于人的经济生活中。经济信用及其意识的现实危机，正是关于人及经济信用的意义缺乏哲学观的恶果。市场化、现代化的社会转型以来，前现代的及极“左”的哲学意识虽然终结了，但适应新时代条件的哲学意识的发育却严重乏力，物欲的伸张及其满足几乎成为整个社会运行的单一旋律，对人的生存及其经济生活的合理性进行哲学批判建构的意识几近寂灭。于是，缺失了哲学批判性思维洗礼的经济意识和经济生活，自然不可能对机会主义和极端功利化行为具有免疫力。故只有自觉站在哲学高度，全面审视经济信用与人生存自由的关系，合理定位经济生活和现实功利在人生存自由中的地位，为人在市场化、现代化经济生活中求得自由提供终极性、总体性的观念支撑，实现对经济生活和经济信用健康发展方向的透彻把握，自律性的自觉守信意识才会因具

备了根本性思想前提而可能普遍生成。可喜的是，目前经济哲学和经济伦理学研究的兴起和逐步升温，预示着对经济生活进行哲学观照的进程已经启动。

(2) 充实守信意识的精神基础，培育自觉守信的非理性情结。自觉守信意识的生成，既要有其理性的根据，也必须有相应的非理性力量的呼应和支撑。

首先，树立自由取向的人文本位的经济信用观，提高经济行为人的精神境界。守信虽然与生存自由在本质上是统一的，但却往往要以功利牺牲为代价。从纯功利视野来看，自觉遵守经济信用，是与人们的功利意志、功利情感和功利欲望相矛盾的，守信活动本身并不能激发、培育和强化人们自觉守信的情感、意志和欲望。然若把功利取向的信用观切换为自由取向的信用观，守信的功利代价与生存自由的内在统一关系就会清晰地浮现出来，这不但会促使人们把守信的功利代价，看做生存自由的特定实现形式和必要手段，从而避免因这种代价而对守信产生对抗性的意志、情感和欲望，而且还会促使人们自觉自愿地付出这种代价，并在其支付过程中，体验到守信内在具有的壮烈的悲剧之美等高层次的精神愉悦。这无疑有利于自觉守信的情感、意志、兴趣、信仰等非理性情绪的生成。可见，守信所引发的不同性质的非理性效应，直接受人们思想修养和精神境界的制约。要培育起人们关于守信的积极的建设性的非理性情结，就必须树立起自由取向的人文本位的经济信用观。目前经济信用严重危机的现实，正是对无视经济生活深邃完整的人文意蕴，把其完全功利化的做法的报应。

其次，确立以人为本的超功利信用观。普遍竞争条件下以个人为基本单位的功利追求，决定了个人利益必然具有相互区别、隔膜甚至对立的属性，并必然由此导致冷漠甚至对抗性的信用情感、脆弱贫乏的信用意志和唯功利化了的信用信仰。以人为本的信用观固然把功利追求看做信用内在价值的重要依据和重要组成部分，但人的尊严则被确定为信用至高无上的内在价值。这就打消了经济行为人间因各自利益的狭隘性、封闭性所造成的相互隔膜、对立，把其利益连接为一个相互肯定、相互内化、相互渗透的整体，从而不但为积极的非理性的信用情结的生成奠定了内在基础，提供了现实可能性，而且也必然因经济行为人相互间对对方人格、价值的相互肯定、尊重和关怀的实际活动，而能够现实地孵化出上述非理性情结。

再次，把经济活动中对生存自由的追求，落实和具体化为对独立自主的人格追求，坚斥人格奴性化倾向。守信所具有的生存自由效应在人格这一心理生活层面的具体表现，就是自主自强独立自主人格的生成，就是

对外在依附化奴性人格的唾弃和超越。而经济生活中的一切失信现象，则都是外在依附的、寄生的奴性人格的表现形式，体现着屈辱被奴役的生存状态。故守信情感的生成、守信意志的提高、守信信仰的巩固，有赖于树立起人格独立意识，把由守信所铸造成的独立人格内在具有的自由的生存魅力，和超越外在依附的生存状态所内在具有的丰富的审美享受，转化为生存的基本内在需求，在内心深处由衷地生成对守信所具有的独立人格的期待和渴慕，并把其转化为守信的内在热情；相应地也有赖于在内心深处生成对失信所导致的外在依附性、寄生性奴化人格的厌恶、憎恨情绪和对失信的防范心理。

3. 他律性自觉守信意识的外在化培育

心理学的社会学习理论显示，观念的生成并非完全受人自律意志支配，而是也为观念在特定条件下的收益状况制约着。改变约束条件以提高观念的收益水平，观念就会得以生成。故守信意识可通过这种改变外在条件的他律方式来培育。

(1) 发挥社会基本架构的强制规导功能，模塑他律性的自觉守信意识。社会基本结构是意识的重要约束力量。古人所谓“为人君者犹孟也，民犹水也。孟方水方，孟圆水圆”，就是对王权及其外化了的政治结构强大社会影响力的形象描述。孟德斯鸠则也认识到了不同政体对包括道德精神在内的不同社会风俗所具有的各不相同的影响力。故只有把信用原则分别置入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统一体这一约束着人们行为的最强有力的社会结构之中，使信用同时成为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经济基础和议政决策、晋升淘汰、审核评价、舆论生成与监控等上层建筑各层面的功利收益的前提条件，相应地，使失信无论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各环节，都无一例外地付出相应代价，久而久之，上述所谓的他律性的自觉守信意识系统，就会逐渐通过条件反射机制的反复运行，逐渐在人的内心世界中生成，并逐渐固化为普遍持久的内在心理结构，成为确保人行为的信用取向的一种基本的内在精神力量。

(2) 实现经济行为的组织化，构筑“个我”与“社会我”相统一心理。“人们并不是孤立地生活在社会中。他们面临的许多困难和挑战反映的是团体的问题，这些问题需要团体的持续努力才能发生显著改变”。经济信用危机的实质，是个人主义意识形态驱迫下的人们利益间僵硬对立，以及由这种对立所导致的对他人、社会利益尊严的蔑视。经济信用建设就是要克服自我中心化意识，消解失信的心理基础，同时实现“个我”与“社会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我”的沟通与协调，培育尊重他人、社会利益的观念，构筑守信的心理前提。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依赖性，决定了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把个人分散的经济行为按照行业分工在适度规模内组织起来以组织化形态来从事活动，以改变其经济活动分散、孤立的传统状态。当然，进一步的理由还在于，“如果在一个社会中，人们相互依赖程度高，社会认可对一个人实现自己的目标必不可少的话，那么人们讲道德也就不会承受这么大的压力了。因此，在一些有同质文化，共同价值观和集体导向的社会组织中，很少有违背集体规范的也就不足为奇了”；“热爱秩序、节约、俭朴和正义，正如促进社会的幸福一样，对于财富的增加也是有效的动力。这些道德几乎永远是由公共组织来培养的”。具体来说，组织化的经济活动方式，至少在如下方面有利于自觉守信意识的普遍生成：第一，个人经济行为的组织化所具有的规模优势、功能放大优势和效率优势，有利于个人对群体认同感、凝聚力的提高。第二，群体内部建立起的包括信用项目在内的全面奖惩机制，是守信的外在动力。第三，群体内建立的全方位沟通交流和信息披露机制，有利于协调群体各层面关系，减少对立和冲突，提高群体内聚力。

(3) 建立个人利益的社会实现机制，消除失信行为的利益基础。经济信用反映着社会整体的长远利益，未必始终与个人现实功利相统一。这构成了个人通过失信于社会来追求其当下利益的行为赖以发生的现实利益基础。故消除信用与个人现实利益间的这种一定程度上的矛盾，就成为培育人自觉守信意识的重要环节。首先，建构起扶个体现实利益的社会机制，改变个体现实利益仅仅由个体孤立地来负责的局面，以化解个体功利与群体发展、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物质需要与精神需要间的矛盾，对自觉守信意识生成的阻滞效应。目前，社会各界组织所普遍推行的再就业工程，以及一些关注弱势群体的做法，就是这方面的有益探索和努力。其次，在整个社会结构、制度体系高度上，有效地降低信用行为入经济社会生活的机会成本，为其有效地积聚起具有充分比较优势的社会资本创造相应的制度环境，使信用追求获得更为丰裕的经济社会收益，弥合信用追求与个人现实功利一定程度上的脱节和矛盾，夯实守信意识生成所必须的利益基础。

4. 全方位着眼，在系统社会工程高度培育自觉守信意识

新信用观认为经济信用是受开放性的多元综合力量共同制约的，故守信意识的培育就不是社会哪个领域、哪些人的课题，而是一切领域、一切人的共同课题，必须立足于完整的历史观，在系统社会工程高度，通过充分发挥社会一切基本要素的相关功能，全方位、多层面、社会化地来培育

守信意识。局限于肤浅的历史观，满足于片面、破碎、机会主义的社会观和人生观，仅仅从生活某层面着手，或过分夸大、强调和依赖某些方面的措施来培育守信意识的做法，决不会取得实效。从这个意义上看，经济信用的现实危机，不过是过去单一、片面的信用建设观念所引发的恶果。故放弃用任何单一方案特别是用纯经济的、或纯法律的手段，来培育信用意识的做法，摆脱急功近利的建设心态，开展长期的系统性、整体性工作，是目前经济信用建设必须首先解决好的问题。

参考文献：（略）

作者简介：肖士英，男，1962年出生，副教授。1991年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获硕士学位；1999年晋升为副教授；2000年7月毕业于南开大学，获博士学位。2001年进入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理论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近年来在《光明日报》（理论版）、人大复印资料等刊物发表文章十余篇。主要研究方向为经济学方法论、经济哲学、经济伦理学与经济社会学。

通信地址：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经济系 邮编：710069

电 话：（029）5300922 （029）8307737